

● 中国文学

“五四”时期现代长篇小说论

陈 思 广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陈思广(1964-), 男, 新疆库尔勒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博士生, 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小说研究。

[摘 要] 中国“五四”时期现代长篇小说是在“五四”“人的文学”思潮的影响下才真正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初步转型。人的文学的凸现使“五四”现代长篇小说家们开始在广阔的艺术视野中探寻世界, 表现人生, 作品所表现的面对命运与既有秩序的抗争态度, 与“五四”文学“人的自觉”的光芒相映成辉。有个性的复杂人物的描写, 双重视角的透视特别是对人的自身弱点所酿成的悲剧的批判, 人的多重意识世界的揭示以及在双重文化的烛照中透视国民的灵魂, 在追求叙述手法的多样化和强化叙述的主观色彩的同时走向文体的自觉等艺术特质, 使它和旧文学彻底区别开来, 并真正迈开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现代化的步伐。

[关键词] “五四”时期; 长篇小说; 人的凸现; 小说力点; 文化反思; 双重视角; 文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 I 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1-0092-06

发端于“五四”时期的现代长篇小说, 并非如短篇和中篇小说那样一开始就涌现出如《狂人日记》、《阿 Q 正传》等这样一批显示出极高起点的标高之作, 它不仅出现的时间晚, 在内容与形式上也显得极为浅表, 作家们缺乏自觉的长篇小说的文体意识, 多将长篇作为拉长篇幅的小说来创作, 直至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才开始走向定型与成熟。可以说, “五四”时期的长篇小说起步迟、起点低、成就平是不争的事实。但是, 晚熟并不意味着在它缓慢的萌发过程中没有为其后来的茁壮成长提供新的基因, 更不意味着自身的裂变不会在历史的演进中分解出异元的质素。相反, 它恰恰为长篇小说日后强健的生长和自身创作独特性的形成确定了内在的机缘, 使得“五四”以后的现代长篇小说在经过了短暂的低谷徘徊后, 迅速走上了充满勃勃生机的发展道路。

新质之一: 小说创作力点的位移——人的凸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狂飚, 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推进到一个急速的节奏, 长篇小说尽管以“慢半拍”起步, 但当它一踏上这条新的轨道, 就逐渐显示出它与以往长篇小说不同的一些新素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 由“五四”运动拉开序幕的中国现代文学, 直至 1922 年才开始出现长篇小说作品, 在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 长篇小说的数量相当有限, 从 1922 年至 1929 年, 据笔者的统计, 共有 30 部。在这些作品中, 蕴含着我国现代长篇小说新质的一些端倪, 而 1929 年出现的《倪焕之》, 可以说标志着现代长篇小说草创阶段的结束而开始步入新的创造性阶段。故本文的重点, 则主要在于探讨“五四”后, 20 世纪 20 年代的草创阶段中, 长篇小说所隐含的新质。

1922年2月,泰东书局出版了张资平的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这是张资平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小说的开创意义在于以“人的生活为是”,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使“人的文学”这一新文学的革命主张,首次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里得到了真切的落实。10月,王统照以长篇小说《一叶》表达了他初期“爱”与“美”的人道主义情愫。随后,顾一樵的《芝兰和茉莉》(1924)、张闻天的《旅途》(1924)、张资平的《飞絮》(1926)、《苔莉》(1926)、《最后的幸福》(1927)、孙梦雷的《英兰的一生》(1927)、洪灵菲的《流亡》(1928)、老舍的《老张的哲学》(1926)、《赵子曰》(1927)、《二马》(1929)、苏雪林的《棘心》(1929)等相继问世,为“五四”后的长篇小说卷起了第一股潮头。这些带有实验性质的长篇小说虽然思想艺术价值有待磨练,但其探索价值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即:在内在构思上,作家们在酝酿构思、设计情节和表达主题时,无一例外地将“人的文学”作为高扬的旗帜,将塑造人物的性格作为小说创作的主要力点,以人的命运作为叙述纽带组构全篇,从故事的叙述转向人的形象塑造,这种创作力点的转移,标志着现代长篇小说的建构开始了新的历程。

人的凸现必然使那些走出国门的小说家在涉笔长篇时,从各自的生活与体验出发,表现人的生活、人的情感、人的命运,这样,人物的生存空间与活动空间就不再单纯地拘泥于九州方圆,而是与域外相联通,呈现出广阔的时空背景。《冲积期化石》、《棘心》、《旅途》、《流亡》等就在较为广阔背景下,展示了域外生活及人物命运,拓宽了小说的表现域。

人的凸现也使作家们努力塑造出具有艺术魅力的人物形象。“五四”时期的长篇小说家创作均处于最初的探索期,尚未显露出卓越的人物刻画才能,但人物由朦胧至清晰,性格从模糊单一到鲜明复杂,数量从少数至群像的渐变轨迹还是明晰可见。《冲积期化石》中的人物少且带有符号性质,至《飞絮》、《苔莉》、《最后的幸福》后,人物渐多且性格鲜明。《老张的哲学》虽没有写出老张集商、兵、学“三位一体而钱本位”于一身的复杂性格,但丝毫不掩饰对老张身上散发的腐烂的市侩庸俗的铜臭味的强烈厌恶。赵子曰是“老张”的尾巴,却无“尾大不掉”的毛病,作家将百家姓的首姓赋予他,就是要以他为代表挖出潜伏在民众身上的国民劣根性。而到了《二马》,老马那事事恪法祖宗,时时倨傲他人,酸迂颓唐、固步自封、得过且过的多重性格已具备典型的模样了。

“五四”是“人的发现”与“文学的发现”的时代,对人的自我价值、社会价值进行自觉地探求,以“人的重新定位”为起点对社会与人进行再反思、再观照,是“五四”作家孜孜以求的创作目标。故而,无论海外学子坎坷艰辛的生存之路(《冲积期化石》、《棘心》);还是小知识分子漂泊不定命若游丝的人生之旅(《一叶》);无论青年男女在“五四”初期为争取恋爱自由、妇女解放而付出的艰辛努力(《飞絮》、《苔莉》、《英兰的一生》);还是革命青年在大革命失败后对黑暗现实强烈的激愤及对革命前途的不屈追求(《流亡》);以及市民阶层各自不同的人物命运与生活道路等(《老张的哲学》、《赵子曰》),都成为艺术家选取并呼应思想启蒙这一时代声响的自然选择。

“五四”更是精神大解放的时代,回应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的呼声更是“五四”长篇小说家一致的创作使命。《芝兰和茉莉》就通过几个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纠葛,抨击了封建家长制对人情感的压制和破坏。张资平的爱情系列长篇《飞絮》、《苔莉》、《最后的幸福》,大胆地表现青年男女挣脱爱的羁绊,追求个性解放而惟情至上,惟欲至高。作品的主人公大多已获得恋爱自由的权利,家长的干预或他人的阻拦已不能从根本上左右他们争取爱情解放的道路。他们追求的是两性相吸,两情相悦,与传统的发乎情止乎礼的观念相反,他们是发乎情越乎礼,将所有的陈规陋习都抛之脑后,尽情地享受情的欢愉与爱的满足。他们的命运多以悲剧结束,但惟其悲剧性的结局才透视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才反映出“五四”时期青年男女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困顿之旅。当然也应该看到,他们视爱为生命却只将性欲的满足等同为爱的满足,而爱的原生点又缘发于一方的感官刺激或兽性的冲动,他们是一群身子和脑子虽降临于新时代却发育不健全的早产儿。

人的凸现还包括对人物内心世界即人的情感、欲望等意识与潜意识活动多层次多角度的展示。中国的长篇小说由说书艺术形成的传统一向不擅长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自宋以来的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更是将人的内心欲望压抑到了极点。这使得我国心理小说极不发达。受现代思潮的影响,“五

四”作家们也开始向内转,利用长篇小说的文体优势,直接充分地表现人物的内宇宙,包括潜意识的心理活动。与传统小说侧重于“做什么”与“怎样做”,注重人物的外部言行相比,五四时期的长篇小说开始了“想什么”和“怎样想”,注重人物的心理意念。最先涉足这一领域的还是张资平,他最早尝试在白话小说中描写性心理。张资平刻意在男女青年性苦闷、性压抑、性爱过程中妒忌、烦闷、疑虑、犹豫乃至因失恋的痛苦而导致的性变态心理上做文章,因其率真精细而迎合了众多读者的接受心理。以《苔莉》为例,小说以隐藏于克欧和苔莉内心的心理奥秘为主线,突出两人不同时空不同场合的内心波澜,把他们在爱欲裹挟之下沉湎无忌又患得患失的心理流程写得惟妙惟肖。“五四”时期的作家多是借心理描写手法刻画人物的心理,而那种将心理分析、主观感觉作为目的而非手段来支撑全篇的心理小说,只在“新感觉派”那里才得以实现。

“五四”现代长篇小说力点的位移缘于人的文学的确立,起始于那批走出国门的先驱者。他们在广阔的艺术视野中探寻人生,将社会的视角代之以自我的观察,将“文以载道”的思想代之以个人思绪的表达,尤其是作品所表现的面对命运与既有秩序的抗争态度,与“五四”文学“人的自觉”的光芒相映成辉。在人物塑造上,“五四”长篇小说虽然没有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但一些有个性的复杂的形象,还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人性的透视上,“五四”时期的长篇小说响应了“五四”个性解放的时代呐喊,那挣脱束缚与维护旧制的夹缝中痛苦煎熬的人性揭示,赢得了无数青年的强烈共鸣。特别是作家们对人的自身弱点所酿成的悲剧的揭示,使得“五四”长篇小说的反封建性不仅与同期的中短篇小说迥然有异,也比一般的反封建题材更见力度、更显水准。

新质之二:文化反思——双重视角的交汇

“五四”时期长篇小说一个突出的特质是对人性弱点的批判与双重视角的观照。所谓双重视角是指“五四”长篇小说家在揭示中国文化的流弊与改造国民性时,既以东西方的文化观点横向地予以审视,同时又以传统与现代的眼光纵向地予以烛照。鸦片战争后,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再盲目自大而开始认真地反省自身文化的弊端,为国运的衰微探因溯源,以寻求图存与自新之路。辛亥革命虽获得成功,推翻了旧的封建体制,但人们很快就发现距人们所期待的目标仍有相当大的距离,封建的思想观念仍然残存在人们的头脑中。因此,“打倒孔家店”,铲除旧的文化观念,建立新的价值体系,用新的文化心理、伦理道德促进时代的变革,尤其在西方文化的观照下把握东方文化的脉理,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重大课题,也成为新文学创作者们着力表现的重大母题。

首先是老舍,从传统与现代的视角中闪现出“五四”先驱者睿智的思考。《老张的哲学》是老舍的第一部长篇,以往人们常常注意的是这部小说近似油滑的幽默风格,实际上这是老舍在整体文化的反省与改造中批判人性弱点,建构新的文化个性的起步之作。小市民李应与龙凤、王德与李静是两对情意绵绵的恋人,他们自由恋爱的结局都以男方的退却而告终。其中的缘由固然有权、钱的迫压导致的精神臣服,但这妥协的背后何尝不是双方人格的缺失所造成的悲哀!王德与李应生活在“五四”个性解放的时代,但是他们没有抓住生活提供给他们的机遇,以此撬动他们的生活历程,更没有在实践中反省人性的弱点以改善自身,调整自我,而是自我封闭,自我排拒,甚至不切实际的过高地估计自己,最终丧失应有的机会而一事无成。他们是一群受现代文化冲击却被传统文化所戕害尚未真正觉醒的迷茫者。

与张资平相比,老舍笔下的人物多了压抑的色彩和妥协氛围,多了传统的观念侵蚀,少了现代的思想洗礼。老舍更看重从传统与现代的比照中体察国民的缺失。这一点在《赵子曰》中更为明了。赵子曰胸无大志,不学无术,好高骛远,什么都学又什么都学不会。他以各种名义骗取父亲的钱财,以满足他吃喝嫖赌的丑恶生活。对于西方文明,他提出“简捷改造论”:将西方的一切发明,拿来为我所用,不用讲什么进取的精神、研究、发明等等。这种坐享其成,只想在精神上包揽东西文化全部为我所用、而又无须奋斗的空想思想,正是赵子曰对自以为老大的中国传统观念中负面因素的因袭。老舍尽情地嘲弄这个看

似“万物之灵”实为“万物之蠢”，“人中之灵”实为“人中之愚”的草包，意在揭露与鞭挞传统文化中腐朽没落的思想对人心灵与肉体的侵淫，以唤起民众自新自强自力自重之心，在反省与批判的同时寄寓着作者建构新的文化个性的急切之心。李景纯就是将“香味永远吹入有志的青年心里去的”理想人物。他与赵子曰游谈无根形成鲜明对照：工作不论巨细，一概做得扎扎实实；事情无论大小，一应有条不紊。他脚踏实地，面对现实，宽于待人，严于利己，被同学称为“学问，品行，见解，全第一”！他主张革命要从具体事情入手，光说不做永远无望。他恪守自己的信条并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李景纯踏实严谨、求实进取的作风，无疑包含着老舍对理想人物应具有的内品质的明确肯定。这种立足于现代意识，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最终摆脱沉重的因袭，走向建构与完善新的文化心理的艺术之路，日后成为老舍不断叩问的主题。

《二马》从东方与西方的角度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双重文化的观照。老舍有意将老马放在异国的土地上，就是要在中西文化的背景下比较中英两国人的不同，以衬出国民性的荒谬之处。在老舍看来，生成于传统农业社会土壤上的中国文化，其深层结构是“农”的，“乡土性”的，其本质还是一种礼俗文化，属伦理范畴；西方近现代文化是资本主义工商文化，是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的，属法理范畴。中国要迈向现代化首先要扬弃传统的礼俗陋习，建立健全合理有效的法理机制，使礼俗文化法理化。为此，老舍在作品中主要设计了因循守旧、碌碌无为的老马；虚心学习、年青有为的李子荣；讲法守约又自负傲慢，礼诚相待又固存偏见的伊牧师、温都太太等三种人，通过他们之间的性格冲突，烛照出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实的双重困境。通过《二马》，人们看到了落后的礼俗文化与先进的法理文化的现实差异，看到了生成于传统农业社会土壤上的中国文明在“老化”的道路上滑行的险境，看到了要建设中国的现代文化，就必须扔掉沉重的历史包袱，将西方法理文化作为核心建构的必然选择。需要说明的是，老舍赞成以英国的法理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建构，并不是要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他对于传统文化中合理的部分如老马尚自然、重人伦等都予以了明确的肯定。

西方文化视角的确立使“五四”的先驱者们拉开了与中国文化的距离，相对冷静而又客观地从西方的文化角度反视民族文化，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文化批判视域，从而确立了从西方的文化视域中改造国民性为他们基本的创作动力和着力追求的创作目标，为“五四”新文学的发展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这也是“五四”现代长篇有别于其它体裁的一个独特之处。诚然，他们对西方的了解还显得平面化，其“救世良方”也过多地强调道德的自我完善等诸多传统因素，保守性与狭隘性在所难免，但他们毕竟摆脱了简单盲目地审视问题的单一视角，将中西文化的优秀特质糅合、互补生成一种崭新健全的文化品格与国民性格，将全球视为一个整体的现代眼光与世界意识，依然熠熠闪光。

“五四”时期的长篇小说对知识分子人性弱点的思考相对来说显得较为薄弱，但对个性解放中所表现出的软弱与屈从及其悲剧的揭示还是显示了较强的力度。《棘心》是苏雪林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主人公醒秋是一个深烙旧思想印记又受新思想熏沐的知识女性，在法国留学时极力逃遁同学秦风撒下的漫天情网，惧怕家人的责骂而忠守家庭的包办婚姻，将拒绝秦风的求爱自诩为平生第一个光荣的胜仗。实际上，醒秋之后曾痛感不擅文辞又冷若冰霜的未婚夫对她的轻视而一度皈依天主。作者本人不幸的婚姻更使人不能不感到这一屈从的背后流淌着无尽的悲哀。他们的悲剧究其根本都在于软弱的外表下埋藏着屈从的灵魂。这些思考反映出“五四”长篇小说家积极的探求精神，尤其是对悲剧内涵的思索出现在上世纪初期的20年代，确实难能可贵。

新质之三：从混沌走上自觉的文体意识

茅盾说：“‘五四’以后的文坛上充满了信手拈来的‘即兴小说’，许多作者视小说为天才的火花的爆发时的一闪，只可于刹那间偶然得之，而无须乎修炼——锐利的观察，冷静的分析，缜密的构思。”的确，“五四”时期的现代长篇小说家多凭一时的兴致提笔创作，很少考虑长篇小说的作法，不太注重长篇小说

的文体意识。但是,如果我们稍加审视的话,还是明显地感受到,与传统章回小说相比,叙述手法日渐多样化,叙述的主观色彩大为加强,在蜕变的同时谋求文体的多变并走向自觉,是“五四”现代长篇小说在文体演进上所表现出的最显著的特征。

胡适在论及短篇小说时说:“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即是生活的“横断面”。“五四”时期的长篇小说家在创作长篇前大多都尝试过短篇小说的写作,故而他们以生活的“横断面”方式构思长篇,抛弃章回小说那种有头有尾、情节因果性连贯的模式,相对就显得驾轻就熟。《冲积期化石》截取的是鹤鸣留学前后国内外生活的一段经历,以他的一封信开头,用倒叙的方式展开故事,颇具新意。倒叙、预叙、插叙、补叙等多种艺术手法的运用使小说在叙述结构上与传统小说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另外,中国章回小说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文备众体,但那多是从说话人系统中全知全能的叙述里展现的。“五四”长篇小说将书信、日记等引入长篇,则是限知叙事,以此作为显现主人公心灵的一个窗口,既真实细腻地剖解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又丰富了长篇小说的叙述艺术。可以说,只有到了“五四”小说家这里,叙述的多变才真正成为自觉的追求。尤为重要,这时的小家们都明白“小说的任务是在描写人生,表现感情,故无论作家取怎样高度的纯客观的第三者的态度,但仍不免有多少主观的意识或幻想之表示。即艺术的真实,是从我们的主观,我们的特定感情滤过出来的。”因此,他们无论采用何种叙述角度,都摒弃了说书人的口吻,以个人化的写作姿态介入其中。《冲积期化石》、《飞絮》中的“我”,不是游离于故事之外的说话人,而是参预人物及故事情节变化的行动者与叙述人,是故事中的角色,故事中的诸多情节与“我”密切相关,“我”的一切随故事情节的变化而变化。即便是第三人称全知叙述也不是与己无关的客观叙述,如老舍小说中的景物描写,就让人觉得“物境之美而由心中说出”。这就突破了旧小说全知全能的叙述模式,叙述者的主观情感也就自然融会其中,无形中强化了叙述的主观性。

我们也应看到,“五四”长篇小说家的创作大多是试作,有限的经验也多是从几本中国章回小说和外国小说中得来的,在不断地摸索与实践才逐步走上正轨,难免在创作中呈现出一些过渡性特征。如《一叶》混乱的叙述,不时地将说话人与叙述者混为一谈,破坏了作品的阅读效果。《老张的哲学》中那半白半文的文字连老舍自己都感到羞愧。这是新的体裁在其形成伊始必然出现的问题。没有他们的探索与实践也就没有现代长篇小说的成熟与发展,他们的经验与教训为自身也为后来者的拓进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印记。

总之,中国“五四”时期现代长篇小说虽然与晚清长篇小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却是在“五四”“人的文学”思潮的影响下才真正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初步转型。没有“五四”现代长篇小说最初的奠基与历史性的突破,也就没有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长篇小说走向成熟,走向世界的开端。对此,郁达夫说得好:“现代我们所说的小说,与其说是‘中国文学最近一种新的格式’,还不如说是‘中国小说的世界化’,比较得妥当。”的确,“五四”现代长篇小说家在现代小说的转型上的所有努力,其根本意义都可以归结在这一点上。

[参 考 文 献]

- [1] 茅 盾.读《倪焕之》[N].文学周报,1929-05-12.
- [2] 胡 适.论短篇小说[J].新青年,1918,4(5).
- [3] 张资平.小说研究法[J].国民文学,1934,1(2).
- [4] 老 舍.我怎样写二马[A].老舍文集:第 15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 [5] 郁达夫.小说论[A].郁达夫文集:第 5 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

On Modern Novels of the May 4th Period

CHEN Si-gu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CHEN Si-guang (1964-),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modern &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 novel.

Abstract: Though the modern novels of the May 4th Period were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novel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y fulfilled their preliminary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with the influence of the idea of “human literature”. The foregrounding of human literature enabled the modern novels of the May Fourth Period to probe into the world and depict human life with a wide artistic point of view. The struggle in the face of fate and established order depicted in these novels corresponds with the “human awareness” which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May Fourth Literature. The portrayal of complex characters with individuation, the analysis of dual personality, especially the criticism of the tragedy caused by innate defects of people, the stylistic awareness as a result of the effort to achieve the narrative diversity and the deepening of narrative subjectivity, all these singled them out from the old literature and this marks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Chinese novels.

Key words: May 4th period; novels; foreground of humans; focus of novel; cultural reflection; duality of perspective; stylistic awareness